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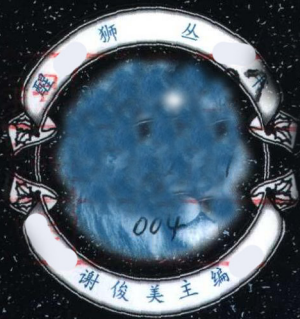


● 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

新民说

梁启超 著 黄 坤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

新民说

梁启超 著
黄坤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醒狮丛书

谢俊美 主编

新民说

梁启超 著 黄珅 评注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王秉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0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ISBN7-5348-1717-X/C·12

定价:12.00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夭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述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直到五

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目录

醒狮丛书总序·····	谢俊美(1)
梁启超与《新民说》·····	黄 坤(1)
第一节 叙 论 ·····	(46)
第二节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	(48)
第三节 释新民之义 ·····	(54)
第四节 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 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	(56)
第五节 论公德 ·····	(62)
第六节 论国家思想 ·····	(68)
第七节 论进取冒险 ·····	(77)
第八节 论权利思想 ·····	(88)
第九节 论自由 ·····	(98)
第十节 论自治·····	(112)
第十一节 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 之原因) ·····	(118)
第十二节 论自尊·····	(134)
第十三节 论合群·····	(144)
第十四节 论生利分利·····	(149)

第十五节	论毅力	(166)
第十六节	论义务思想	(177)
第十七节	论尚武	(182)
第十八节	论私德	(196)
第十九节	论民气	(227)
第二十节	论政治能力	(234)
附录：梁启超研究重要著作举要		(249)

梁启超与《新民说》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作于鸦片战争前夕的诗，深切地道出了时无俊彦的历史悲哀。

洋务运动兴起，人才问题变得尤其紧迫。虽然办了军校，却培养不出良将精卒；空有商业局，没有外出通商的资格；使馆易建，大使难觅；窃据高位者尸居余气，噩噩相对，习于无耻，懵不知怪。生当民族竞争愈演愈烈的新世纪，不学习、掌握和运用武器、新技艺、新思想、新文化，决不可能见富强之效。但这除了应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得有通达时务的人才。有器无人，器同虚设，一旦有变，这些器物只是拱手奉敌而已。当清政府向西方购买枪械之时，在日本出现这样的嘲笑：即使中国能买到好的武器，也没人使用，迟早会落到他们手中。（《思纬查壘台短书·报贝元微》，见《谭嗣同全集》）甲午惨败，朝野震惊，光绪发愤图强，思雪前耻，改弦更张。但内自阁府大臣，外至行省督帅，却找不到一人足以

胜御侮折冲之任。加上将无才学，兵乏操练，驱之上阵，哪能不败？肉食盈廷，乏才为患。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的困乏，就是国家的困乏。对西方社会已有所认识的郑观应，曾提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口号：“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见《郑观应集》）时事多艰，人才孔亟，就当时的现实需要言，在和西方列强的争战中，通晓时务、立志改革的人才，比腰缠万贯的豪富，更加重要，只有人才济济，方能共济时艰。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见《曾国藩日记》）李鸿章也通过其洋务实践，认识到学习西方，必须起用一批懂得新学的新人。

维新变法，是比洋务规模更加壮大、意义更加深远的政治运动，人才问题也就更加突出。湖南素称守旧，但当维新运动兴起后，人思自奋、家议维新，风气之开，为各省之冠，其功应归于时务学堂、南学会的创办。从此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几有平五岭而一逴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壮飞楼治事十篇·湘粤》，见《谭嗣同全集》）虽守旧之徒，诋毁万端，但风潮激荡，终难遏抑。维新变法作为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需要全国各地“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千军齐力，万马共鸣，方能成功。（《论湖南应办之事》，见《饮冰室文集》）但当时大多数地区，都没有时务学堂那样的人才摇篮，不能培养一批“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因此在维新运动中，也就不可能出现像湖南那样鼓舞人心的局面。虽然光绪已锐意变革，维新成了一时风尚，但实际所变，却十分有限，“有法无人”是一个重要原因。从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机器精奇，进而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术文化，进而注意西方的政体法制，进而看到有法无人之弊，认识到改革需要人才，都与形势的发展，现实的需要同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晚清改革的必然结果。

据谭嗣同说：正是由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讲学湖南，才使湘人闻风兴起。反过来讲，当时人才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不讲学的缘故。普法战争结束后，俾士麦在一次演说中说，德国能战胜法国，靠的是学生而不是士兵。当时美国军队仅2万人，军事开支不到教学经费的十分之一，但就凭重视教育，国家富强，雄视世界。在上光绪的书中，康有为一再强调：西方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由于“今变法百事可立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请开学校折》，见《康有为政论集》）教育改革，成了维新变法的先声。当时的英国人常自豪地夸口说：“其他国家的学校，可以培养出许多博士、学士，而我们英国的学校，只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返观中国，科举制度驱天下有用之才，“消磨日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禁锢思想，败坏心术。特别是使人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不识古今，不知五洲，以至作为国家精华、官吏候选的士人，竟然不知汉祖唐宗，更无论欧美各国了。结果使“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损国败俗，莫此为大。故欲得人才，莫先于改科举；改科举，莫先于废八股。梁启超称赞光绪下达废除八股、改革科举的诏书，使天下移风，竟讲新学，耳目既开，民智骤进，倨傲顿释，谬陋尽消，如泉涌涛奔，不可遏止，是中国由衰而盛，由弱而强的一大转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专集》）就连张之洞也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劝学篇·变科举》）

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其影响主要在士人，其目的是造就一个通晓时务的新的官僚阶属，用梁启超的话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新，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通议》，见《饮冰室文集》）但还在洋务时期，有识之士就已指出：小小补苴，仍是粉饰习气，无补存亡大计，力挽将倒之狂澜，非大举更张不可。“尤在官民一力，上下一心，富必求其民生之本

富,强必求其风气之自强。使闾阎家自教战,胜于国家之练兵;使闾阎家自求财,胜于国家之厚敛。人人明格致而制造自精,人人勤治生而利源日辟,合中国三百兆人谋之,何患不济!若东开一局,西设一厂,岁靡县官千万万金钱,而仍无丝毫实际,则何补之有哉!”(《与程禧之书》,见钟天纬《别足集》外篇)确实,中国积弊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只有将全民动员起来,盘根错节的弊端,方有应刃而解之日。但当时整个社会,都有见物不见人、重士不重民之弊。保守派固不必说,即使象奕訢、文祥这样的洋务派首领,坚信中国的问题不在兵士素质,而在武器。就连号称通达时条的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也认为西法该注意的只是军队、外交而已,从不曾有人以蓄养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梁启超尖锐地批评洋务派将费尽心计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毫不心痛地送往敌国,换取毫无用处的东西,但一说到“开民智,植人才,”就都以没有经费搪塞,宁可把钱在外交和军备中白白浪费,不肯节约一些用于教育事业。(《变法通议》,见《饮冰室文集》)直到变法开始,这种积弊仍在作怪。一些谈变法的人,或是抱“肉食者谋,我何与焉”的想法,指望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吏有所作为;或是认为中国民俗卑劣,根本不足成事,从而委心异族,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由此,形势虽然如狂澜滔滔,世俗依然如醉乡梦梦,前途已入泥泞之境,国人半在酣睡之中。

同为含生负气、戴天履地之人,生活在同样的日月之下、同样的山河之中,具有同样的头脑、同样的手脚,为什么各民族有的强盛,有的衰亡?魏源已经看到:仅凭学习西方的枪械,是不可战胜外敌的,因为“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借用明代朱纨的一句话:“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这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败在于人事。郭嵩焘曾感慨地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变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

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见《使西纪程》）作为洋务派的继承者和批判者，维新派对此的认识要清醒、深刻得多。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自立、自强，关键在于民气。“一国中大多数数人，对于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为严重之保障，常凛然有介胄不可犯之色，若是者谓之民气。”（《新民说·论民气》，见《饮冰室专集》）但民气有待于民力、民智、民德的支持。没有民力的民气，必无结果；没有民智的民气，则无价值；而没有民德的民气，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英国哲学家斯宾塞阐述人伦治化，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纲，“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严复《原强》，见《严复集》）严复即根据斯宾塞的学说，提出：“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同上）国家的贫富强弱，即民力、民智、民德的验证。宋代苏轼认为“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应诏集·倡勇敢》，见《苏东坡全集》）维新派也持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政事如同草木，只有在与其性质最适宜的土地上才能生存，这土地，就是国民性。如果民力柔弱、民智低下、民德浇薄，虽有富强之政，也毫无用处。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由愚民组成的国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强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民弱国弱，民强国强，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故梁启超说他“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烈烈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文集》）

在上光绪第五书中，康有为描述了当时国内弱、昧、乱、亡的景象。“所谓弱，不仅是财弱、兵弱、艺弱，还在民智弱、民心弱。所谓

昧，即昧于万国情状，昧于历史变迁，进而昧于瓜分之势、侵权之谋，昧于新法兴利、变法自强。所谓乱，即贿赂公行，淫乱于上；官差衙役，蹙乱于下；揭竿斩木，乱机遍伏。所谓亡，即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言路结舌，疆臣低首，而无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可骇可悯。”（见《康有为政论集》205页）当时的中国人，强横者放恣桀骜，卑弱者委琐愚钝，遇事则互相牵掣，互相推诿，遇敌则低首下心，神萎气短，上行下效，莫不如此。最可悲的是，当时西方列强，正怀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瞠其鹰目，涎其虎口，磨牙吮血，伺机而动，国势岌岌，有如危屋，但国人或酣嬉鼾卧，游宴作乐，拱手无为，苟安旦夕，“喻以瓜分而不知恐，惕以灭种而不知忧。”或目睹危难，神情颓唐，如楚囚相对，岌岌顾影，心死志馁，气索才尽，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即使身负时望，手握重权的哀哀诸公，也只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众喙咷咷，空言无补。如果说有心者唯知叹息无以为计，那么无耻者更是嗜利而借以谋私。就连甲午战争的惨败，也未能将国人真正触动。当敌氛压境之时，举国惶惶，上下震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旦和议既定，则又载歌载舞，以邀以嬉，其官则依然惟差缺是问，其士则依然惟科举是望，其民则依然惟衣食是求。无视印度亡国之事，不知波兰分裂之祸，则靖康之变、甲申之恨，势必重见华夏，再污神州。即使一些高谈西学，以维新先觉自居的人，也是拾牙慧，蒙虎皮，将西学看作敲开利禄之门的新八股，将洋务当作进身致富的新阶梯。当此“全地球人种之竞争，愈转愈剧，万马之足，万锋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虽合无量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付之，犹恐不得当，乃群无脑、无血、无气之俦，偃然高坐，酣然发睡于此世界之中，其将如何而可也！”（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文集》）有志之士，能不扼腕痛惜！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骨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

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叙论》，见《饮冰室专集》）民气不振，民德不张，容忍滋长了社会上的种种罪恶，有意无意地阻挠着变法的进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会见翁同龢时说：“中国养民之政不可不亟讲也。政有四大端，曰教民，曰养民，曰安民，曰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养则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安者弭兵，新者变法也。”（见《翁文恭公日记》）在维新运动中，“新民”是变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变事而不变法，只是小变，变法而不变更人，等于不变。康有为强调：国以民为本，不思教养，是自拔其本，故需行“养民之法”、“教民之法”。（《公车上书》，见《康有为论政选集》）严复认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原强》，见《严复集》）梁启超更是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和标准，提出新的国民概念：“要之，使其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陋谷之民。”“苟缺此之资格，则决无以立于天壤。”（《论教育当定宗旨》，见《饮冰室文集》）梁启超说他作《新民说》，就是想探求国民腐败堕落的根源，同进步的西方各国进行比较，使国民明白病因所在，以警示、鞭策自己。借用孟子的话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权为顽固派把持，仇视、破坏乃至千方百计扼杀改革。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大业，决不能依靠保守的官吏、腐败的政府。只有从国民做起，即唤起国民议论，振作国民精神，使改革之事，成为国民共同的事业，方能成功。所谓“得民心”，含有二层意思：一是所制订的政策、所实施的事项，必须合乎民众的需要，代表民众利益；二是所办之事，民众的才智能够理解、